

科学与人文

台北故宫遗失的“女尸图”：可疑的性别

韩健平

摘要 台北故宫博物院曾遗失旧满洲档中保存的一幅明代尸图。工作人员认定尸图中的裸体人形为女性，故称“女尸图”。然而，这种性别认定是在常识和个人经验的帮助下，对一幅墨迹严重湮漫的次生性图像做出的，存在认定错误的可能性。本研究考察了历史上的尸图制度，发现尸图是由政府刊行的一种填注式的、男女共用的文书，但是，在人形图像的性别上一般处理成男性。基于这种制度安排，“女尸图”性别为男性的可能性很大。同时，本研究将“女尸图”与其他具有亲缘性的尸图进行比较，发现“女尸图”的一些所谓的女性特征主要是由墨迹的湮漫造成的，它的一些可辨别的形态特征却显示其性别很可能为男性。

关键词 台北故宫 女尸图 性别

2007年的早些时候，有人发现台北故宫珍藏的、翡翠白菜上的螽斯，其头部的一根触须缺损了一公分。此事一经媒体报道，社会一片哗然。台北故宫的文物管理工作一时遭受社会巨大的质疑。该风波也让另一件陈年无头公案进入公众的视野。媒体披露，台北故宫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曾遗失过一页旧满洲档子。旧满洲档子是十七世纪早期清人入关前，主要用老满文撰写的、按时间顺序记录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圣祖皇太极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事务的一种编年体性质的历史资料长编，是研究满清开国历史及其早期文字演化过程的重要资料。遗失的这页档子尚存有其正面与背面的两张照片。2005年，台北故宫博

作者简介 韩健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海峡两岸的网络媒体和纸质媒体都有报道。例如，新华网的通讯稿为“台北故宫迷案 38年前遗失满清“女尸图”(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7-03/30/content_5916072.htm)

乔治忠 1994.《清代官方史学》.台北:文津出版社.页 85.

物院以“《满文原档》”的书名出版这批旧满洲档子时，收录了这两张照片（见图1）。

这件档子是利用明朝的一份公文书的背面来书写的。图1中左页书影里正向的满文，以及右页书影里正向的汉文，如“甲子年正月记”等，应是档



图1. 左页的书影为遗失档子的正面照片，右页为其背面的照片。两帧书影系复印《满文原档》第四册第237页、238页后，再行扫描而成。

子的内容。可以说，这件档子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图1中被正向的满文和汉文叠压的、字体较小的、依稀可辨认呈反向的汉文，以及仰面与合面的人形，是明朝公文书的内容。这种满人利用明朝公文书的背面书写档子的情形，在清入关前的档子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当时满人纸张匮乏，于是就利用很可能是战争缴获来的明朝辽东地方衙门的文书，在其背面或正面的空白处来书他们的档子。

一 明朝的验尸报告：“女尸图”

这件旧满洲档子广泛引起人们兴趣的地方，是它所利用的明朝公文书，实际上是一份已经填写完毕的验尸报告。图2呈现了该验尸报告正面的情形。其中，正面与合面人形，是南宋中晚期以来验尸报告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仰面人形书影的左侧，如果仔细辨认被叠压的汉文，会发现它们分上、下两栏排列，内容有关身体的各个部位。例如，上栏左数第三列的汉文为“两脚踝”。官员们在勘验完尸体后，会在相应的身体部位下填注结论。我们看到，“两脚踝”下有“无故”二字，表示该身体部位正常。合面人形左侧的文字也分上下栏。上栏第一列文字应为验尸报告中的惯用语“对众定验得”，其下的三列小字，应是现场填写的具体死亡结论。在下栏，我们还可辨认出“干犯人”、“仵作行人”等文字。其下的小字，是相关人员的签名，表示同意验尸报告中的内容。其中，仵作行人是具体进行尸体勘验的衙役。

这份验尸报告没有文件名。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认定报告中的人形为女性，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5.《满文原档》.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我们。我们在认定该尸图性别时，头脑中参与的知识基本上是一些性质不明确的东西，尸图又是一种次生性图像，这都令我们怀疑基于它们得出的观点是否可靠。

二 性别认定中的缺陷：性质不明确的知识与次生性图像

我们在认定尸图的性别时，所利用的大脑中的知识基本上是一些性质不明确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来历不明的知识。如果反省我们认定该尸图为女性的理由，我们可以想到的证据有繁复的发式、柔和的面庞、丰满的乳房、纤细的身材、缺乏肌肉等等。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女性的特征。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尸图的性别为女。然而，这些头脑中的知识，是来源于常识、个人经验、传统习俗、医学权威，抑或是当代的绘画作品，或其他的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路径，或它们之间的一种交互的影响？恐怕我们已经很难究明。

当我们未经批判就将这些性质不明的知识应用于认定十七世纪早期的一件尸图的性别，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知识形成的背景与过程。也许它们与十七世纪初期产生那张尸图的历史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么，这时将这些知识运用于那件尸图的性别分析，就有可能得出不可靠的结论。例如，在我们看来，头上插戴花卉是女性特有的行为特征。一个正常的男士是决不会头上簪花的。这其实仅仅是我们今天的看法。如果将它推广到古代，认为古代男性也不会将鲜花插在发髻里，就有可能出问题。因为在唐、宋时期，男士也有头上簪花的礼俗。因此，利用一些性质不明的知识去分析历史上的一些现象，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另外一个造成性别认定存在问题的原因，是我们所看到的图像是一种次生性图像。这里的次生性图像，指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原图生成的一种新的图像。首先，它是原图泅到纸背而形成的图像（见图1）。满人在书写档子时，原图所在的验尸报告成了背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尸图，是原图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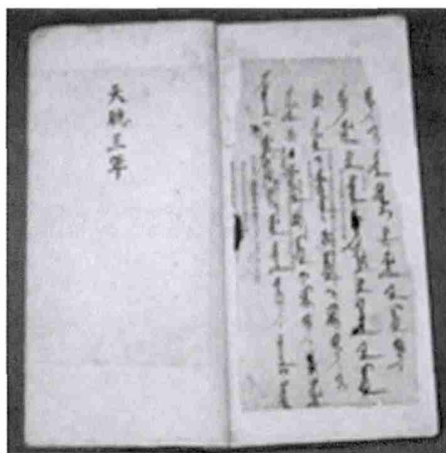


图3. 裱背过的旧满洲档子被装订成册的情况。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展示的图片。

管彦波 2006.《中国头饰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页 113-115.

到档子这面的图像，而非原图本身。原图我们已经无法直接观察。满文档子后来被裱背，并两两背靠背地裱糊在了一起，然后装订成册（见图3）。这样一来，原图所在的那一面被糊上了，无从直接看到。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装订成册后方便阅读。因为，很多旧满洲档子是利用明代公文书的背面写成的。如果不把它们背靠背地糊在一起，把明朝公文书封在里面，那么，装订成册后的一些页，就会一面是旧满洲档子，一面是明朝的公文书，显得杂乱。然而，这种裱修工作的结果，是我们不能再直接观看明朝的公文书，而只能从档子这一面看洩过来的墨迹。由于一些墨迹没有洩过来，所以，次生图像会丢失一些原图像的物理信息。例如，图4中仰面人像的左脸庞部分轮廓线、眼睛、右小手臂的部分轮廓线就缺失了。



图4. 图2中仰面人像局部。

其次，因为我们尚不清楚的原因，尸图的墨迹非常湮漫，导致它与原图有大的差距。例如，人像的发髻、眉毛、鼻头、颈部、左侧乳房下方、左侧腰部、肚脐和下身等部位，都有大块的湮漫的墨迹。虽然我们不知原图的情况，但是，作为验尸报告，因为人命关天，它不会是这样湮漫的一幅图。该尸图墨迹的湮漫，已经非常严重地改变了原图墨迹的物理形态。

我们现在看到的尸图是一种次生性图像。依据它的形态特征来判断性别，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一些在我们看来支持其为女性的一些图像形态特征，很可能是由于墨迹信息丢失或墨迹湮漫，或二者的叠加影响造成的。也就是说，很可能是由次生性的图像形态特征造成的。然而，这些次生性的形态特征与性别无关。因为，不论是墨迹洩到纸背这一过程，还是墨迹的湮漫，都不带有表征性别的企图在里面。也就是说，在它们所造成的形态特征背后，并不存在什么性别的意义。

在对台北故宫遗失尸图的性别认定上，缺乏批判性地利用头脑中的知识，以及将次生性图像作为分析的资料，导致了一种不太能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如果要解决该尸图的性别问题，我们就需要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本研究将从两方面路径来究明其性别。首先，在本文中，将十七世纪早期的这件明朝尸图，看成是明朝尸图制度的一个实例，它应该符合该项制的安排。因此，通过考察明朝尸图制度有关性别的处理方法，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论出这件遗失尸图的性别。另外，对于研究对尸图性别具有重要意义的仰面人形湮漫严重，基本上

失去了单独作为解决该问题的资料的资格。但是，历史上存在与这件尸图形态结构相近的具有亲缘性的尸图。借助这些尸图的帮助，我们可以某种程度上把握台北故宫遗失尸图仰面人形的原貌，进而从中寻找形态特征方面的有意义的线索来分析其性别。

三 尸图制度史的维度：尸图的性别很可能是男性

在历史上，尸图是一种由政府制定的、用填注的形式报告尸体勘验结果及死亡鉴定结论的格式标准化的文书。它由政府部门刊刻印行，然后下发州、县衙门执行。这种制度出现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并为元、明、清三朝所继承。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伊始，就下令各府衙刊印《尸图式》。万历年重修的《大明会典》卷一百七十八“检尸”记载：

洪武元年令。各府刊印检尸图式。每副三幅，编立字号半印勘合，发下州县。如遇初复检尸伤，划时委官。将引首领官吏，佯作行人，亲诣地所，呼集应合听验人等。眼同仔细检验，定执生前端的致命根因。依式标注署押。一幅给与苦主，一幅粘连附卷，一幅申缴上司。

因此可知，台北故宫遗失的尸图也应当是辽东当地府一级的机构刊印的，而非现场绘制。这从该件尸图中的文字也可看出。在图2中，上、下两栏排列的汉字，规整且较大，属于刊印。其下的文字较小，书体不呆板，是现场填注或说“依式标注”的文字。

明朝各府衙刊印尸图这件事本身，实质上是一个标准化尸图的过程。命案现场的尸体体征各不相同，即使就大体上讲，也有男女、老幼、高矮、胖瘦等等的区别。府衙刊印的尸图不可能照顾到所有尸体可能出现的情况。它们制作的一定是一种标准化的尸图，适用于各种尸体的勘验。那么，明朝政府是如何来标准化这种尸图呢？

有迹象表明，这种标准化实际上是通过将尸图统一为一种成年男性人形的形象而实现的。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尸图虽然不多，但是，在年代分布上较为均衡，元、明、清三代都有。从这些尸图的性别来看，将尸图统一为一种男性人形，很可能至迟从元代就已经开始了。

萧源等辑 1986.《永乐大典医药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页 69.

黄时鉴辑点 1988.《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页 120.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七九二，史部，政书类.页 165.

图5是元代《检验法式》中的尸图。该尸图是男女共用的。因为在右页的左数第一列中，列有两胯这个部位。在“两胯”下小字标注有“男子茎物肾囊，妇人阴户”等字样。这说明，虽然男女在第一性征上不同，但是，在该验尸文件上都有所表现。或者说，它能满足男女两方面的需要。该尸图的仰面人形的下身有遮盖布，掩盖了男女在第一性征上的差异。但是，仍有线索表明其性别为男。该尸图人形的乳房较为平坦，所梳发式是一种常见于男性的高挽的椎髻。



图5. 元代《检验法式》中的尸图。出自嘉庆年间兰陵孙氏元槩重刊本《洗冤集录》卷前的《圣朝颁降新例》第四页、第五页。辽宁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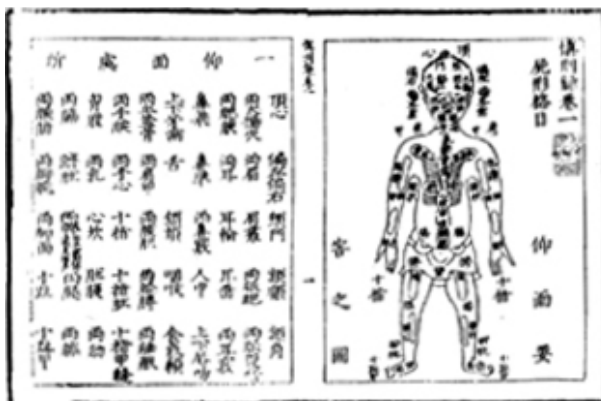


图6：《尸形格目》中的尸图。采自明人王士翘辑《慎刑录》，嘉靖29年刊行。该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974，子部，法家类。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图6是明代嘉靖年间《尸形格目》里的尸图。左数第二列列有两胯这个部位，下标注小字为：“男子茎物肾囊，女人阴户。”这表明该《尸形格目》也是男女共用。但是，该人像的发髻也是通常见于男性的高椎髻。在人像的下身部位，标有一“肾”字。这里的肾即外肾，是男性生殖器官的一种隐晦的说法。这表明，该尸图的性别也为男性。

图7为清代《刑部题定验尸图》的仰面人形。我们看到，在两胯下标注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名称，表明该图男女共用。但是，该人形的乳房平坦，面部浓眉大眼，都表明它是男性。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将尸图处理成男性，似乎是尸图制度的一个传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从这种情况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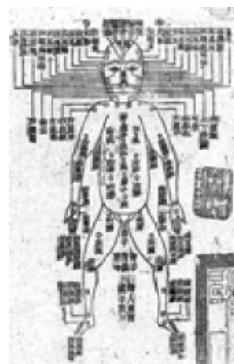


图7：清《刑部题定验尸图》仰面人形。收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善本文影像资料库。

看,台北故宫遗失的尸图,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男性。

四 重回尸图:寻找男性性别的线索

从尸图制度历史的维度来看,旧满洲档中的该明朝尸图的性别很可能是男性。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思想上的准备,回头再来观察该图,也许会发现我们此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男性性别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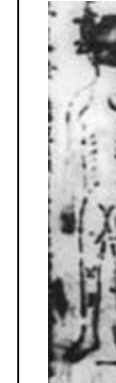
然而,对于研究该尸图性别具有重要意义的它的仰面人形,湮漫严重,部分物理信息缺失,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它已经很难有效地说明一些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技术去除该图中的湮漫,弥补缺乏的物理信息。虽然,按明代的法令,该尸图应该是府衙一级的政府刊刻印行的一批尸图中的一件,因此,它应该有一批同板的印本。然而,我们并不走运,尚未见到有它与同板印本存世。因此,我们目前的所能做的,是寻找它的亲缘性尸图。借助于这些亲缘性尸图的帮助,我们有可能某种程度上把握台北故宫遗失尸图仰面人形的原貌,进而从中寻找形态特征方面的有意义的线索来分析其性别。

在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尸图中,兰陵孙氏元槩重刊本《洗冤集录》与大木藏明代版本《洗冤录》中的尸图,与旧满洲档中的尸图表现出亲缘性的关系。下表为三个版本中的人形对照表。其中,孙氏本人形图取自图5。大木本人形图源自该版本《洗冤录》第七、八两面。旧满洲档本人形图取自图2。旧满洲档中的仰面人形墨迹湮漫、残失损严重,但是,它的合面人形保持原貌较好,并且在形态结构上,与孙氏本、大木本非常接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旧满洲档本尸图,与其他两个本子的尸图存在亲缘关系。

借助于亲缘版本的帮助,我们会发现,旧满洲档尸图仰面人形中原来被认为是具有女性意义的那些形态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墨迹的湮漫造成的。该尸图仰面人形头部的看似繁复的发髻,现在看来很可能是由表征系缚椎髻的布巾的墨迹湮漫形成的。因为,在大木本仰面人形头部,就有这样的布巾形象。这种观点也得到该旧满洲档尸图合面人形头部形态特征的支持。因为,在该尸图的合面人形头部,并没有繁复发式的影子,而是一种类似于孙氏本和大木本中的椎髻——这是一种古代男性常见的发式。

大木藏本《洗冤录》是一种明代刊本。现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该所主办的网站“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中,有该版本的PDF文本。该版本网页地址为 http://shanben.ioc.u-tokyo.ac.jp/main_p.php?nu=B3884400&order=rr_no&no=00763&im=0010002&pg=2。

表1. 三种版本中仰面与合面人形对照表

仰面			合面		
孙氏本	大木本	旧满洲档本	孙氏本	大木本	旧满洲档本
					

旧满洲档本仰面人像里的双乳，粗看起来是非常女性化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左、右乳房在形态特征上并不对称。人像的左侧乳房显得更丰满，更具女性特征，而右侧乳房则显得平坦，说它是男性性别的也不为过。丰满的左侧乳房的形态特征，很可能是由该乳房左下缘下方的、貌似表征肋骨的墨迹的湮漫造成的。因为在孙氏本和大木本中，描画肋骨的线条都很清晰。但是，在旧满洲档本中，仰面人形里的肋骨湮漫成了一坨。这一坨湮漫的墨迹恰巧给人一种错觉，显得它上方的乳房很丰满。现在看来，这种丰满的形态特征，实际上是由一些次生性因素造成的，并不具有性别上的意义。

旧满洲档本仰面人像里孕妇般圆浑的小腹，实际上很可能是表征最下面肋骨的墨迹湮漫造成的。因为在孙氏本中，表征最下面肋骨的左、右两条线条，就给人以小将军肚的感觉。但是，在旧满洲档本中，这两条表征最下面肋骨的线条几乎湮漫成了一个圆孤，从而给人一种孕妇的错觉。



图8. 旧满洲档本尸图仰面人像局部。

旧满洲档本仰面人像面庞柔和，身材纤细，在当初被作为女性特征，其实也是成问题的。因为，从孙氏本和大木本来看，面庞柔和与身材纤细并非女性的特异性标志。孙氏本和大木本中的尸图人像面庞都很柔和，身材也都很纤细，但从其双乳的形态来看，却都是男性。

由上面的讨论可知，原来认为具有女性意义的那些旧满洲档尸图仰面人形的形态特征，其实并不可靠。相反，它的椎髻发式，以及有些平坦的右乳，都表明其性别更可能是男性。

五 结论

台北故宫遗失的这幅十七世纪早期的尸图,在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然而,将该尸图的性别认定为女性却存在诸多的不可靠的地方。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与尸图有关的资料,它们背后的意义还有需多不确定性,但是,基于这些资料所重建的尸图制度史,以及借助于这些资料对该尸图原貌的重新把握,其结论都表明,将该件尸图中的人形认定为男性,在目前看来可能是一个更能令人接受的答案。

Male or Female: Deciding the Gender of the Cadaver in the Missing Diagram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HAN Jianping

Abstract: The naked human cadaver in a Ming diagram missing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female, thus the diagram has been usually referred to as that of a “female” cadave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gender, however, can be mistaken, since it was made according to common sens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ink in which the image was drawn severely smudge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rules of producing diagrams of human cadavers in Chinese history. It finds that such diagrams were forms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needed to be filled in every specific case and were applied to both gender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cadavers were usually represented as males regardless of their actual genders. Thus it is well possible that the gender of the cadaver in question is male. In addition, by comparing the diagram of the cadaver with related other one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o called “female features” of the cadaver formed due to smudging of ink, while the cadaver’s discernabl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show that it is well possibly male.

Key word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the diagram of a female cadaver; gender